

浙江

商帮与上海经济

1840 —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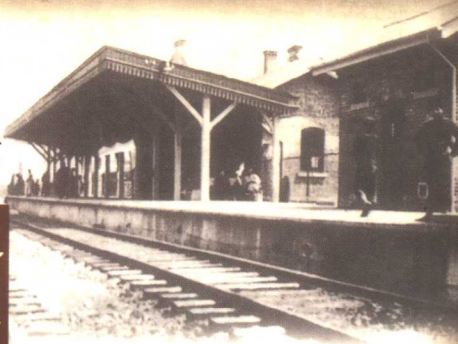
◎陶水木 著

近代化研究

Zhejiang

Shangbang yu shanghai jingji

jindaihua yanjiu



上海三所書店



◎陶水木 著

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

1840 — 1936

近代化
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

著 者/陶水木

责任编辑/张大伟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沈 鹰

责任校对/李京林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

装 订/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4.875

印 数/1—2100

ISBN7-5426-1320-0

K·86 定价 30.00 元

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大批商人。浙江是个私经济出现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现今个私经济已占全省国民经济的 40%,浙江的商品市场年成交额已居全国“九连冠”。浙江商人兴起较早,队伍庞大,实力雄厚。改革开放初期,“十万温州人跑供销”一时成为媒体宣传的热点。现在,全省约有 250 万经营户常年在外经商务工,他们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了上百个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他们还纷纷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所以有人说:浙江是现今出商人最多的地区,浙江商人是最有才干的商人群体。浙江商人的崛起,不但促进了浙江经济的腾飞,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人具有经商天赋与经商传统。考察近代经济史,浙江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近代许多城市的崛起都与浙江商人有密切的关系。上海崛起时,浙江商人约有 20 多万人,主要从事钱庄、航运、棉纱棉布、五金、颜料、茶叶、丝绸等业,还有相当一批人出任洋行买办。在北京经营钱庄、成衣业、药材业的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商人。在近代天津,浙江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银号钱庄、南北土产、远洋航运、钟表眼镜、绸缎呢绒、金银首饰及从事买办的也相当多。在九省通衢、商

贾辐辏的武汉,浙江商人经营水产、银楼、杂粮、五金、银钱、水电等诸多行业,实力居各客帮之首。还有大批浙江商人经商海外,其中许多人脱颖而出,成为世界著名商人。探讨浙江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总结其经营活动的经验教训,是件很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所以,我在1987年就著文提出应当重视浙江近代经济史研究,并就若干重要问题作了考察。香港回归前夕,我又考察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原因,指出香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非英国殖民当局所恩赐。香港今日的繁荣,是与浙江商人,特别是与宁波商人所起的重大作用分不开的。五年前,我指导陶水木攻读博士学位,初拟以浙江商帮与中国经济近代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这是一个大课题,要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逐一进行考察,综合分析。后考虑到时间可能来不及,于是就选定上海作为突破口,以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作为论题,他还以此申报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这仍然是个大题,也是个难题,它要求把商帮研究与区域经济近代化研究结合起来,需要较全面的理论与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陶水木以其勤奋扎实的努力,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课题,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他倾注了五年心血的研究成果。

这本书以近代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作为考察区域,以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比较全面、准确地考察了自鸦片战争至1936年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浙江商帮经营工商业的成功经验,是一本很有见地、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我十分同意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宪文教授在评阅本文时所作的总体评价：“(本文即本书)通过大量史实与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详尽地论述了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各个领域中的发展,揭示了浙江商帮在经济转型中的演变轨迹、特点,总结了浙江商帮在经济运行中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这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论文课题新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整个研究浙江地区商帮方面有明显的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汉民研究员看了他的博士论文后也认为,该文“把商帮研究与区域经济史研究融合在一起,拓宽了商帮研究的领域,这对于进一步开展商帮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史,都有积极意义”。

“商”在近代是个涵盖极广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本书所说的“商”正是这样来界定的,这是适当的。书中还提出了浙江商帮的概念,我以为这是可取的。因为商帮是近代对某客籍商人群体的习惯称谓,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书中还涉及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三大财团问题,认为从人员关系上看,与其称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势力为江浙金融财团,“倒不如称其为浙江金融财团更为确切”;如果说1921年前存在着所谓的华北财团的话,那么之后“实际上已演化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是否站得住,还可以讨论。三大财团是就地域而言的,而不是从籍属来说的,所谓江浙财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势力,当然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以江浙籍居多,尤以浙江系资本家占优势。

近代浙江商帮研究是个大课题,除上海外,浙江商帮在武汉、天津、北京、苏州等地的经营活动都有待研究。就本书而

言,也还有需要补充完善之处。例如,关于旅沪浙江商帮与上海外国势力、上海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其对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影响,关于浙江商帮对近代上海重大事件的态度以及上海重大事件与浙江商帮经济活动的关系等,都有待深入研究。书中前两个附录也有待补充、完善。好在作者告诉我,本书定稿后,他仍在查阅资料,准备就有关问题再深入进行专题研究。我赞赏这种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并期待着他在这一领域不断有新作问世,也希望有更多学人来从事近代浙江商帮研究。

金普森

2000年2月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前 言

浙江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早在春秋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过“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越国大夫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后,弃官从商,累金巨万,世称“陶朱公”,被后世商人称为始祖。秦汉时期,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商人不但从事国内贸易,而且与日本等地的海外贸易也已很普遍^①。秦汉以降,随着生产地域的扩大,商品化生产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增加和市场的拓展,浙商队伍不断扩大,活动区域日益拓展。进入前近代时期,浙商的足迹已遍布全国大小城镇,并且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或同乡兼同业)会馆、公所,自发形成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人群体即商帮。作为前近代时期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在促进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化由此艰难起步。浙江商帮抓住这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积极向近代商业及工矿、金融、航运等业发展,逐渐取代前近代时期鼎盛的徽商、晋商成为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孝通曾评论说“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他们“在南中别树

一帜,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处,亦在势力范围之内”^②。无疑,浙江商帮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演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但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末”政策的影响,更由于50年代中期后“左”倾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浙江商帮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帮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已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前近代兴盛的一些传统商帮如徽帮、晋帮等,对近代崛起的浙江商帮的研究虽也有所进展,但仍不尽如人意。这里不妨先对这一研究状况作一历史的回顾与评述。

大体而言,学术界对浙江商帮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蔚南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是这一时期宁波帮研究、特别是旅沪宁波同乡组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它论述了宁波帮在上海的兴起原因,着重探讨了四明公所的发展沿革,公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及公所以对宁波帮发展的影响^③,对以后宁波帮研究有很大影响。

40年代,《中国内幕》发表的《重庆灵魂的浙江财阀》^④一文,概述了浙江财阀的特征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指出浙江财阀是对浙江(也不限于浙江,包括江苏)在上海的实业家的集团称谓,它从买办资本发生而以民族银行资本为骨干,是银行资本家集团;浙江财阀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银行资本与政府资本结合的基础上的。文中关于浙江财阀的界定,显然受了日本学者观点(见后述)的影响。钟树元的《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⑤,概述了宁波帮的兴起、主要经营行业及宁波帮在所谓江浙财团中的核心地位。商隐的《宁波人何以能在商场活跃》^⑥,则分析宁波人在商界长盛不衰的5个方面原

因。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50 年代中期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民族工商业被彻底改造,私营工商业者成了被改造、批评的对象,以致无人敢问津近代商人、商帮及商会研究,浙江商帮的研究自然也莫能例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改革开放事业逐步发展。1984 年邓小平又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浙江商帮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初步统计,至 1998 年,国内公开刊物发表的关于浙江商帮、商人的论文有 30 余篇,其中主要是关于宁波帮的研究成果。

吴克强等的《饮誉四海的“宁波帮”》^⑦是邓小平号召发出后最早介绍宁波帮的文章,它概述了宁波帮的形成、向海外发展及改革开放后宁波帮造福桑梓,积极参与家乡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不过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张敏杰的《论宁波帮》^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关于宁波帮的学术论文,它概略论述了宁波帮的形成和向海外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因素,分析了新历史条件下宁波帮的特点,肯定了新时期海外宁波帮在促进“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巩固新时期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研究重点放在当代宁波帮与祖国建设方面。

林树建的《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⑨将研究视角转向近代宁波帮,该文考察了宁波帮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宁波帮所经营的主要行业,并与徽帮作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宁波帮的经营特色。周静芬探讨了浙江籍资本家兴起的时间及构成问题,认为浙江籍资产阶级形成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主要是从官绅、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⑩。

另外,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80年代相继编辑出版了2本关于浙江商帮的资料性研究文集,即《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和《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⑩,为该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础。

进入90年代,浙江商帮研究呈持续发展势头。张守广的《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⑪一文,通过对宁波商人集团产生原因、活动范围及经营内容的考察,探讨了其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点,是近年来唯一一篇探讨明清时期宁波商帮的专文。姚玉明在《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⑫一文中,通过对宁波帮若干文化心态的剖析和研究,从新的视角分析了宁波帮崛起的历史文化内因。陈月明从中国商业从内陆沿江城市向沿海城市,从埠际贸易向国际贸易转移趋势以及宁波帮和徽帮的帮体结构,探讨了宁波帮与徽帮兴衰更替的原因,颇具新意^⑬。

孙善根近年来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宁波帮的论文。在《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他专门分析了宁波籍买办兴起的原因,指出宁波籍买办的崛起是宁波商帮崛起并称雄中国工商界的重要条件。在《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一文中,他又从社会历史环境和群体特征诸方面分析了宁波工商人才群体在近代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商界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各种因素,肯定了以宁波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他的《邓小平与宁波帮》,概述了邓小平与当代宁波帮的交往以及他们一起为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⑭。

黄逸平的《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⑮,探讨了近代宁波帮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认为在上海江浙财界中,浙江系占有优势,而浙江系的“宁波帮”又遍布于各个行

业,是江浙财团的支柱。陈梅龙的《宁波商人与近代上海》^①也概述了鸦片战争后宁波帮在上海举办近代商业、工业、新式金融业的情况,指出宁波帮是上海近代经济的开发者、创建者和近代上海主要商帮。类似的文章还有蔡继福的《宁波帮与上海工商业》^②。

林树建的《宁波商帮》一文^③,详尽论述了宁波商帮从初始形成到迅速发展、趋于鼎盛和转移海外 300 余年的起伏发展史,探讨了宁波帮兴起的历史背景、地域分布和主要经营行业。他的《宁波商人》^④概述了宁波商人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经营行业、活动地域、经商特色。该书虽以通俗小册子的形式行世,但看得出通篇内容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周静芬近年还发表两篇关于宁波帮近代化的论文,她的《鸦片战争后宁波帮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宁波帮旧式商人的转型》一文,论述了鸦片战争后宁波帮部分旧式商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情况。在《上海开埠是宁波帮近代化的机遇》一文中,她指出上海开埠后贸易中心的转移、外资银行、外资轮船公司和外资工业的设立,为宁波帮由旧式商帮向近代化转变提供了条件,并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⑤。

虞和平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中心,探讨了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问题。他指出:宁波旅沪同乡会在整个近代中国城市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居于领先和典型的地位,它不但是现代性同乡组织的起点,而且使传统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渐引入同乡会的组织体制和功能,既表现了近代中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也说明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⑥。

此外,鲍杰主编的《论近代宁波帮》^⑦汇集了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这

一时期关于宁波帮的研究状况和学术水平。沈雨梧编著的《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介绍了 50 位宁波籍企业家落地生根创业世界各地，又不忘桑梓，参与国家、特别是家乡建设的饶有兴味的史事^②。

笔者还注意到，有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论及浙江商帮。其中论及较多的如徐鼎新的《上海总商会史》，该书有多处论及宁波帮，指出宁波帮在上海总商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该书不是研究宁波帮或宁波帮与上海总商会的专著，对宁波帮在历届总商会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和起怎样的作用没有展开计量分析和深入讨论^③。台湾学者张桓忠的《上海总商会研究》^④对总商会会员的地缘构成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计量考察，指出总商会会员中以浙江籍最多，浙江籍会员中又以宁波帮为主，并用图表形式分别表示浙江、江苏及其他各省和宁波帮会员在总商会几个主要年份所占的比重，使浙江帮及宁波帮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一目了然，但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各年浙帮会员具体人数和所占百分比。姚会元等的《“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也较多涉及浙江金融资本，并明确指出江浙金融财团的社会基础是宁波帮，不过他所说的宁波帮是“大宁波帮”概念，不但包括整个浙江籍，还包括江苏、安徽籍^⑤。他在其他几篇关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文章中提出基本与此类似的观点^⑥。张忠民在其新作《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和社会再生产》中也有专目概述前近代时期的浙江宁波和龙游商人，不过他没有使用商帮概念^⑦。

关于浙江商人的个案研究，近年来也有一些，主要集中在刘鸿生、虞洽卿等少数浙帮商人身上^⑧。

国外涉及浙江商帮研究较多的是日本。20 世纪初编辑

的《中国经济全书》^①，在介绍上海各商业帮口时，介绍了浙江的宁波帮、绍兴帮和钱江（杭州）帮。从内容看，所述材料主要来源于1906年《商务官报》发表的《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一文^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学者对所谓浙江财阀、上海财阀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出了不少成果，其中多涉及浙江商帮。1928年6月底，日本报纸首先提出“江浙财阀”概念并作界定，指出江浙财阀包括浙江籍李铭、钱永铭等4人^③。后又出现如《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④、森次勋的《上海财阀之鸟瞰》^⑤、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⑥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一文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是浙江系财界，掌握浙江系财界支配权的是浙系金融业者，并对浙江、江苏等系在工商、金融、航运等业中占的地位作了分析。森次勋的《上海财阀之鸟瞰》，以经济界常用的“财阀”概念来界定中国地域经济势力，指出中国的财阀以浙江财阀居首位，浙江财阀是以金融资本家为中心的财阀，狭义的浙江财阀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籍金融资本家结合势力，广义的浙江财阀包括被浙江财阀支配的江苏等其他财阀。文章概略考察了浙江财阀的形成，以浙江财阀为主的各财系在金融、工商、航运等各个行业中的地位，特别是浙江财阀在金融业的地位。文章对上海主要企业与各财阀关系的考察达到了一个国外学者难以达到的程度，但文中不少企业主的籍贯归属有误。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总结了前人关于浙江财阀的3种解释：一是狭义的，即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浙江籍金融及实业家的总称，这又可分为籍隶宁波、绍兴的浙东帮和籍隶杭嘉湖的浙西帮；二是广义的，即指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浙金融和实业家；三是指以上海为根据地的包括浙江、江苏、广东或其他省

份的金融、实业及财界、政界巨头,因为浙江银行家是主要领导人,所以通称为浙江财阀,并说一般所说的浙江财阀都是这一含义,而宁波帮是浙江财阀的基础(中心)。

四五十年代之际,根岸佶相继出版《中国的行会》^⑦、《上海的行会》^⑧两书,从研究行会史的角度涉及宁波帮。他在后一书中指出:宁波帮是乡党观念异常强烈的乡帮,它把局部的乡谊联系扩大到与同省的毗邻地区以至整个浙江省区在沪商人的范围,形成“大宁波帮”。

在东南亚,新加坡梁元生博士的《19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⑨一文,探讨了上海开埠后广东帮与宁波帮“在经济上的竞争和政治上的对抗”,指出两个商人集团间的竞争对上海和全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派别活动都有影响,该文探述的两个商人集团在政治上的竞争是国内学者较少涉及的。

在欧美,也有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宁波帮、浙江财团。科布尔在他的《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指出,浙江财团或江浙财团来自宁波帮,就是以老宁波帮为核心的扩大了财团,它控制了上海大部分银行、钱庄,大多数的棉布和棉纱厂,大多数的报关行、主要的航运公司和设在上海的多数煤矿公司,指挥着大多数企业家团体。该书还详尽考察了这一财团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琼斯的《上海的宁波帮及其金融力量》^⑩论述了在上海的宁波帮钱庄金融势力及其在发展银行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郝延平在《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一文中对19世纪末浙江帮买办的活动有所涉及^⑪。还有些研究成果涉及浙江商人群体或个人,这里就不一一评述了^⑫。

从以上并不全面的评述中可以看出,几十年来、特别是近

20年来,中外学者对浙江商帮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一)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近代浙江商帮的文史资料;(二)对宁波帮的兴起原因、经营行业、活动地域、经营特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三)已有学者对浙江商帮在江浙财团中的地位及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作了探讨。但是,关于浙江商帮研究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宁波帮,以整个浙江商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则付之阙如;对浙江其他商帮如湖州帮、钱江(杭州)帮、绍兴帮等也缺乏研究,不但没有关于这些地区商人群体的整体研究成果,而且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地区商人的个案研究。二是即使已有的关于宁波帮的研究,其涵盖面也很有限,主要局限于少数著名商人,没有能在艰苦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宁波帮作广泛的研究;没有把宁波帮研究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这一大背景中,通过对宁波帮创办经营企业的综合整理,通过以确凿数据为基础的计量分析,来准确估量和全面反映宁波帮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显然,浙江商帮研究仍是大有可为的。

基于对上述学术史的认识,笔者拟定以浙江商帮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研究作为本书的课题。鉴于上海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经济中心,代表着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最高水平,也是近代浙江商帮活动的“大本营”,所以选定上海作为研究区域。本书所说的“商”,是指近代文献所说的广义的商人,实际上包括各个经济部门的投资者和经营者^③。书中所说的“浙江帮”,也是按近代习惯的说法,泛指近代旅沪从事上述各业的浙江商人,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而结成的既“亲密”又松散的群体^④。至于考察时段,虽然上海在明中叶以后就出现新生产方式的萌芽,此时浙江商人经商上海者为数也已不少,但上海经济近

代化大潮的开启无疑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浙江商帮在上海的崛起也基本与此相吻合,故将本书上限定于1840年。而将下限定为1936年,这是因为该年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经济发展的峰值,此后由于战争及政局的动荡,上海经济一直呈徘徊甚至下降状态;在上海的大批浙江商人也于抗战爆发后转移内地或陆续向港台及海外转移,浙江商帮的实力受到很大影响。另外,由于环境的变化,关于1936年后该课题资料的收集更为困难,这也是将下限定于1936年的原因。

本书在写作中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本书力图突破以往该项研究仅限于宁波帮的缺陷,把研究视野扩大为整个浙江商帮,尽可能反映旅沪浙江商帮全貌,构建浙江商帮研究新的体系;(二)本书注重挖掘新的第一手资料,力求使本书建筑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三)本书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依据经济史的特点和本书的写作意图,书中尤其注意定量分析,务求以精细的图表、数据,全面准确地反映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本书力图紧扣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这一主线,通过挖掘确凿可信的史料,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全面系统地论述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近代浙江商帮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教训,为现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以上几个方面,拙著是否达到写作意图,都留待各位专家学者评判,并祈求得到批评指正。

注 释:

- ① 陈炎:《古代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及林文明:《关于宁波港古代海